

恰如一闪而过的流星 ——毕公天编著事业钩沉

王逊

毕公天一生事业涵盖以下几个方面,即著书、编书、编刊,且各项工作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与积极的社会责任。

由于历史变迁,毕公天早已远离世人视线。但时人对他有“名满海内之文学巨子”(《申报》1918年10月26日,第1版)的称誉,又或谓“文名满天下,神交盈海内,愿一见风采而未能即得者,岂独余一人而已哉?”(陈嘉言:《序言》,《国民快览》第12期,1923年)个中自不免溢美之辞,但其人之声名可以想见。有关其生平资料,以《苏州民国艺文志》“毕公天”条最为详尽,我们据此可知他系江苏常熟人,“民国时期曾在吴瑞书后,接任《苏州日报》主编,时至1945年”,另编、著有《慕侠丛纂》《趣海》《江苏各校国文成绩精华》《辱国春秋》《全国学校国文成绩大观》《青年谋生锦囊》《尝胆录》等书(张耘田、陈巍主编:《苏州民国艺文志》,广陵书社2005年版,第131-132页)。惜哉仅为只言片语,且语焉不详,甚至其人生卒年只得“不详”二字。加之某些著作或许不曾眼,既无详细介绍,亦有理解偏差,难以窥得毕氏传奇生涯全貌,更无从见出其人之巨大声望与影响。今笔者广为搜讨,检得毕氏生平及相关资料若干,可使我们的认识有所完善和深化。遗憾的是仍存不少空白,有待来日递为增补。

概而言之,毕公天一生事业涵盖以下几个方面,即著书、编书、编刊,且各项工作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与积极的社会责任。

著书

毕氏著述甚多,尚无系统整理,今所知有《辱国春秋》及散见各报刊、书籍的评论、序跋若干种,今据掌握资料略作介绍。

《辱国春秋》,四册,上海辱国春秋社1915年印行,今收入沈云龙主编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二辑(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)。该书系对中日“二十一条”交涉始末情况之详细记述,“自日本条件提出以前种种之原因,至中日新约交换以后种种之补救,分为一百二十章,凡各种异同之条文,交涉失败之真相,列强对华之态度及其公

论,中外报纸之论调及其记载,与夫激昂慷慨之函电,沉痛抑郁之文章,逐段逐节附以按语,或查考今昔条约以为比例,或参酌同人意见详加说明,与他家一味载录者不同,而毕君编著之精密有口皆碑”,既有爱国热忱,更兼细致考量,故而社会反响极大,时人称誉此书“取左氏大辱国意义,仿春秋体例而纂者……兹以董狐之直笔,纂辱国之春秋,惊神泣鬼,足以唤醒今后之人心。呜呼!辱莫大于不知耻,凡我知耻之不同胞,不可不人手一编。”随着此书的流行,袁世凯深为恐惧,下令阻碍发行,“不意大皇帝愈阻,而小百姓愈购,故口今风行海内,阅者靡不拍案称快”,其于世道人心之意义甚巨。

毕氏另有零散文章若干,其核心关注仍在国家、民族、社会问题。这其中既有对立国根本的思考,譬如说民国肇始,毕公天却不无隐忧,“其意盖为国民未改其习惯,当轴得便其私图,必内争益烈,从此多事,其论文详载当时沪报”。毕氏言行看似保守,但其立足点不在前后政体优劣之比较,一应判断出自他的政治识见。目睹多年来的世事变迁,他对掌权者的自私和专权有了沉痛的体悟,不能不心存疑虑。“迨项城尊孔命令公布,其又推论袁氏之心即司马之心,因断其将来不为华盛顿,必为拿破仑”,又如“而余近又见其对政府咨询之议论,凡涉是非利害诸端,靡不剖析详明,动中肯綮”。其文虽不存,但时人的评价俱在,足资证明。其对时事判断的内里,实为对一般民众的深切关怀,他在郁慕侠《余之不平者六》一文后有如此评语:“吾国自改专制为共和后,他人则或为大总统,或为大都督,独公天仍旧是个小百姓,不平不平真不平”,调谑的背后,实含讽刺与辛酸。

又有对社会民生的关注。有鉴于当日社会之黑暗败坏,郁悼盒编成《小黑幕》一书,毕公天深为欣赏此举,特地撰序以为鼓吹,文不长,全录于下:

近今黑幕潮流汹涌澎湃,举各界之中,靡不有黑幕。在吾人不幸,行丁斯世,日与黑幕相激战,几致避无可避,破不能破。本社憾之,于是特辑是书,以餮国

人。阅者诸君手披一编,不特各种黑幕之真相洞瞩无遗,且可免受黑幕之欺,是为编辑此书之苦心也。其一片热心肠昭然可见。

毕氏以文学家的身份名世,但其创作多亡佚不存,今检索得以下数篇:爱情小说《不忍离》,刊《好白相》1914年第4期,7-10页。情节很简单:一男子路上偶遇债主,向他索要当日娶妻所借之款。他回家后因无计可施而沮丧懊恼,其妻得知情况后,打算去王富翁家做佣三年,拿工钱还债。父子二人共同将她送到王富翁家,离别之际,痛苦流涕,王富翁得知情况后深为感动,不需此女前人做佣,将工钱奉送,只要求他们“但以后终要克勤克俭,立业成家,不虚耗我一百二十元之数可矣”。此后不数年“家道已小康矣”。故事很温馨,却没什么出彩处。另有:

《昏夜运动官场序(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)》,载《滑稽杂志》1913年第1期,第29-30页。

《滑稽联》,载《滑稽杂志》1913年第1期,第47页。

《两百两字之滑稽联》,载《滑稽杂志》1914年第3期,第74页。云“某知事固风流绰约一翩翩美少年也,近为钟情某名妓而失职,因以滑稽长联赠之”。

《四海题襟集:赠梦花馆主》,载《滑稽杂志》1914年第3期,第108页。

前三篇系游戏之作,赠诗一首也属平常,仅此不足以见出毕氏的创作才华与特色,所幸从他为《慕侠丛纂》所作序言中可以大致了解其文学主张。该文起始就概括了当日文章写作的两种风貌,“有以词藻胜者,有以奇异胜者。以词藻胜近六朝绮丽之习……以奇异胜近嘉祐太学之体”。他对这两种倾向显然都不满意,故期待“试问有昌黎其人为之起衰者乎?”和“试问有庐陵其人为之救正者乎?”他对于“文”之写作的基本主张是“吾人读书论世,发为文章,要贵实事求是,固无取乎词藻与奇异也。”换言之,一则有为而作,一则重视文章内容即“意”,而不取乎形式雕琢与刻意取巧。当有人因他编纂郁慕

侠的文稿而提出“慕侠之文,朴实而无词藻,平淡而不奇异,奚从纂为?”的质疑时,他正色回应,既是为郁慕侠庄严辩护,同时也是对自己主张的详细申发。其意思有两层,一则“人心如面,各有不同,文字亦然,故汉魏以还各有派,虽曰随时代以变迁,要视其人之性质何如耳”,他列举贾谊、司马迁、谢庄、王融、刘向、董仲舒、徐陵、虞信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江淹、韩愈、苏轼诸人的创作风格为例,说明“同以文章名世,而气象之不同”,不可限于一定规程。郁慕侠虽不同时好,自有其特色与风貌。进而他通过杜牧、陈师道等人的观点,强调“文以达词,词以达理,非关乎词藻与奇异也”。究其实,郁慕侠的创作特点可谓有为而作、发愤著书,系对屈原、司马迁创作理念的弘扬和继承,这是毕公天所崇尚的,更是其所追求的。

编书

毕氏所编之书众多,门类也较广,首要的仍与其拳拳爱国之心相关。譬如《尝胆录·附学生救国始末记》(上海:文友社,1919)。为了牢记历史,不至落下“西人谓中国人最富健忘性”的口舌,加之鼓舞民心士气,他又编成是书,“内容有蔡元培、汪精卫、伍廷芳、张謇、孙文、王正廷等数十人之言论,有中国新地图、山东省全图、青岛图及各种新插画,有诗、词、歌、赋曲、联语、戏剧脚本、爱国格言及小说等名人著作,有学生救国始末记,其余要目甚多”。前后两书,一为事件始末之记录,一为国人热血之凸显,前者述往事,后者追来日,相得益彰。《尝胆录》印行后,求者甚重,“自夏历十月以来,蒙惠购第九期《国民快览》诸君,纷纷函索《尝胆录》,足征热心爱国,可敬可佩。惟近日函索者,统计每日约有五百余起,敝处虽有专司其事之人,无如日晷有限,每日寄出不过二百余封,现积函已有二万余件”,幸赖此举,国民精神为之高涨,时人亦高度表彰此书价值,期待“我血性男儿,卧薪尝胆,早雪国耻,以

期自存,毋貽西人最富健忘性,与五分钟热度之谓也”。此书的发行同样遭遇麻烦,“惟值兹国事蝸蟻之际,海内竟有无故戒严之区域,而近日各处寄来之邮件,间有盖当局特派专员检查邮件之戳记者。天下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,良可慨也”,尽管如此,为了“以利交通而便邮寄”,只好“将措词激烈之言论稿,悉行删去”。前后两书都遭到了时局干扰,真当得“虞山毕公天,今之董狐乎?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,以一字之贬,严于斧钺也”之褒奖。

又有游戏之作,如《趣海》(上海:文友社,1915)。其出版广告云:

是书五花八门,趣味浓艳,凡世间有趣的文字,无不容纳,因名《趣海》。类分四十,曰趣影、趣论、趣文、趣方、趣牍、趣说、趣问、趣答、趣经、趣史、趣传、趣记、趣题、趣解、趣章、趣律、趣状、趣判、趣谕、趣告、趣字、趣画、趣谈、趣表、趣电、趣闻、趣诗、趣词、趣歌、趣赋、趣联、趣剧、趣曲、趣调、趣谣、趣声、趣令、趣术、趣谜、趣屑,篇凡四百左右,都十万余言,无篇不趣,无句不趣,诚说部中空前绝后之作也。

又有实用之作,譬如《青年谋生锦囊》(上海:学海书局,1934),该书系上海学海书局委托毕公天编纂,计十二册,分十二类:

总论类,关于青年进德谋生适用之新言论。

求学类,详示识字,办字,读书,看书种种方法。

作文类,辨别古今文体,说明作文要诀。

写信类,指导写信程序及期活用之材料。

尺牍类,特撰各界适用诸体成备之新尺牍。

珠算类,是算法新颖有图有决之新珠算。

笔算类,算术之基本常识及各种习题。

簿记类,各种有图有表之簿记及其记法。

书法类,说明学书用笔及偏旁等等之新书法。

书诀类,关于学画及画题着色之要诀。

常识类,指示交际宴会谈